

# 进一步证实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的形成》读后感

□ 陈民镇



李岗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遗存入手讨论敬天法祖观念的起源,并从考古学和文明比较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为什么说中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呢?首先要注意“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对此,书中也作了辨析,指出现代所说的“文明”有多种含义,既可指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也可指长期延续的文化综合体,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属于文化综合体。从纵向的角度而言,文化的历史要比文明的历史长,文明相较于文化是更高的发展阶段;从横向的角度而言,作为文化综合体的文明可以由不同的文化构成,如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在后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一般来说,作为文化综合体的文明不等同于国家的概念,如我们常说佛教源自印度,主要是就其来自印度文明而言的。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有自身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

文化综合体,与国家形态高度叠合,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作为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文明”以什么为标志呢?过去西方学术界以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文明为参照,提出文字、冶金术、城市三要素的文明标准,但这一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缺少文字,冶金术在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等中美洲地区文明中不见踪影或不扮演重要角色。既然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更高级阶段,文明标准自然需要考察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而不能局限于某几种文明要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并提出国家的两个标志:其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其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对经典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形成》一书指出,根据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的两个标志,在距今51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

代之初,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以南佐、双槐树两个遗址为代表)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目前被学界普遍视作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韩建业此前也撰文指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并已经形成区域王权。《形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录了多篇讨论南佐遗址的文章,包括《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位于黄土高原的南佐都邑性遗址》《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南佐遗址: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东西交流的先行者——上古甘肃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实证,南佐遗址与良渚遗址一道实证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南佐村附近,那里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考古发掘表明,南佐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9座夯土台及其环境围成,核心区中部偏北为“宫城”区,“宫城”区内有大型建筑基址。9座夯土台环列,每座夯土台约1600平方米,外围均有两道环壕。

据推算,9座夯土台的外围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在75万立方米左右,如果每两个人一天完成1个土方,则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书中指出,南佐遗址中夯土台、壕沟、宫殿建造所需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有力证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原生国家或“古国”。在南佐遗址的“宫城”区,出土了精美的白陶、黑陶和绿松石珠,是当时南佐古国礼制与阶层分化的反映。但与同时期的良渚文化相比,南佐遗址缺少繁缛的玉器组合。这要结合作者之前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北方模式、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加以理解。他认为,南佐遗址的发展应属于北方模式,虽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显然有利于长期发展。

总之,《形成》一书对中华文明的基本概念、基本特性以及形成路径作了深入研究,从多角度立体呈现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图景,尤其是对南佐遗址的揭示,使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一步得到证实,反映了中华文明研究的新进展。(据光明网)

# 《史学要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

□ 操宇晴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厘清基本概念。针对一些对“史学”相关概念理解存在的混淆和误区,李大钊开宗明义,对“历史”和“历史的记录”进行了明确区分。他指出,“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名著,无论多么重要,都是历史的记录,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一论述澄清了将历史的记录误认作历史本身的错误观念,同时也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继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页),并解释道:“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史学要论》,第76页)这表明他将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并将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李大钊还阐述了“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即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史学要论》,第85页)。概括而言,“历史”是“主体”,“历史学”则是对“主体”的研究。他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历史学等作出准确而崭新的定义与辨析,为明确学科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科学。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他进一步解释称,经济关系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揭示社会变革的因果律,从而将“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史学要

论》,第78页)。他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史学要论》,第95页)历史学的研究不仅限于“沿革的研究”,即基于事实描述其发展的过程,还包括“推理的研究”,即分析事件间的因果关系,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通过推理揭示普遍规律,历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史学要论》,第87页)。这一分类拓展了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针对当时质疑历史学科学性的观点,即认为难以在多元的历史事实中发现普遍原则或理法的观点,李大钊作出了有力回应。他指出,尽管历史现象复杂多变,这种研究中的困难并不妨碍历史学作为科学的成立。通过系统归纳与推理,可以揭示普遍的规律,“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史学要论》,第91页)

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倡导构建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同时,各门学科在此基础上仍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探讨了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史学功用等问题,从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时代意义。他认为当时许多史学家过于注重“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置之度外”(《史学要论》,第94页)。他倡导,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其目标不仅在于具体史实的考证上,更应致力于“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史学要论》,第92页),承担起建构历史理论的重任。

李大钊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史学要论》中明确表示:“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

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史学要论》,第135页)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他还明确指出:“历史的进程,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因此,他强调:“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超越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史学要论》,第134—135页)这种对人类社会前途的信心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

《史学要论》于1924年出版,1926年即再版,反映出它在当时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在论著中发声响应。史学家李则纲的《史学通论》一书直接引用了《史学要论》关于“历史”“史学”概念的演进。著名学者杨鸿烈在《史学通论》中转载李大钊的历史分类表,并称“这样伟大的系统在史学思想史自有其相当的地位”(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1—163页)。《史学要论》和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学者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称他“开数十年后治学涂术,厥功伟矣”(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408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要论》再次受到高度重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蕴涵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页)的史学经典,仍可感知其智慧、魅力与深刻启示。(据光明网)



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百年来,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白寿彝在《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写道:“《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页)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思想史课程,将史学领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史学要论》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阐述其史学理论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清晰,分为六个部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 《极顶》:探寻泰山文化根脉 留存民间人物心灵史

□ 张艳丽

佛、儒及茶文化的热爱以及公司转型种茶的实验,禹奕泽对最新防虫科研成果的探索应用,美国人诺亚围绕泰山知识开展的抖音直播以及对生态环保理念的呼吁,都显示出小说容纳古今的开放胸怀。

“极顶”不仅指泰山之巔、人生之巔,更是生命之巔,它寓指人向内求索、认识生命本体及其价值后达到生命意义的完成。《极顶》是一部诠释泰山之作,作者不仅将泰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山来塑造,更强调了泰山是万物共生的生命体,着力彰显昂扬向上的生命力。读《极顶》,可真切触摸到生命的庄严、坚韧与温暖。在王宗坤笔下,泰山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石一水,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山洪冲歪的树干以少许根脉接地而生,干枯的小溪渗透石缝以滋养大山,小说写道:“那不是水,那是祖先的血脉”。山中万物已然与人类融为一体,生命是一条涌动的河,孕育着无数生灵,奔腾向前。小说中,质朴的山民怀着敬畏之心探索生命意义、经历生死离合,形成了“勇于生,不畏死”的生命态度。世世代代的歌哭悲欣融入生生不息的血脉涌动,升华为勇毅坚韧、博大厚重的泰山文化精神。泰山,这座凝聚了25亿年自然历史的雄壮奇观向人类昭示着生命的伟大与从容。

王宗坤是带着自发的个体生命意识进行创作的,他说:“这是一次行走与书写并重的写作”。他的“行走”不仅指穿行于山林、与

泰山工友同吃住,更饱含着自己50多年来的生活热爱与生命体验。泰山的儿女自有泰山的灵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泰山人,王宗坤以朴素真挚的民间立场书写山乡巨变,他把“生命”作为扭结泰山与文学的共同点,使作品具有了独到而厚重的生命意识。

学者杨守森认为,生命意识即“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极顶》正是通过描绘人物形象的心灵蜕变,深挖人与泰山生命的律动,完成对生命本体及其意义的探索。小说中最具生命意识内涵的人物是老炮台。这个2岁狼口夺命,23岁坠崖逢生,近知天命之年又遭遇骗婚的传奇人物,于生死变幻中悟出了生命真义:“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了,先是亲人们的希望,而后就是这大山的神奇赐予。”于是,这个受惠于泰山又回馈泰山的老人开启了新的人生,他重做护林人,清理树根,种树,种菜,养鸡,续写父亲留下的《泰山志》。当禹奕泽迷茫时,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当老迟经济困难时,他匿名捐款;当韩义盗卖护山棘时,他为护林员丧悬崖……老炮台不仅传承了泰山文化精神,也呈现出一个遵从内心、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探知生命本义的人生之旅。他与老鹰的惺惺相惜不仅源于绝壁救命之恩,更在于他们历经同样的生死蜕变后达成了一种共同的生命体

认——成熟的生命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绝地重生。于是,人与鸟,不同的生命形式却实现了相通相融,二者共同成为小说中泰山文化精神的象征。

人对生命的认识孕育于磨难中,《极顶》中许多人物都带着生命的伤痕。除了老炮台、禹奕泽,还有不堪承受亲人意外离世而远避生灵的律安、叶老师,身患绝症、孤苦无依的闫顺子……他们在生死艰难之际不约而同地走向大山深处,寻求心灵的重生。泰山,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带着他们看透生命本质,从容面对生死。再次回到泰山之怀,触摸生命脉搏,感受时光沉淀、岁月从容,主人公禹奕泽终于领悟,人生在世,有谁不是带伤而生?泰山的儿女应有泰山与鹰的坚毅与坚韧,生命本是一路歌哭,一路前行。

只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文字才能抵达人心,王宗坤始终怀着真挚诚挚的情怀,忠于本心地写作。无论是长篇小说《太阳的绳索》《向上向下》,还是中篇小说《长路无尽》《何为阿哭》,他都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于心灵困境中剖析人性本相,呈现出现代人的心灵变迁,这正是现代小说的使命与艺术魅力之所在。就此而言,《极顶》为探寻泰山文化根脉、挖掘泰山与文学共同的生命内涵以及留存民间人物心灵史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期待王宗坤这位“文学鲁军新锐”为文坛贡献更多佳作。(据人民网)



在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动下,一批表现当下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蓬勃而出,王宗坤的《极顶》(作家出版社)便是其一。这部作品讲述了泰山林业人世代护林的奋斗历程,塑造了有使命、有担当、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现代林业人形象,勾勒出一部泰山儿女的心灵史。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宏阔的视野与独特的题材。《极顶》以泰山为背景,以林业为题材,以林业人为主角,书写新时代意义上的“山乡”与“巨变”,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让我们看到了山乡题材更为深广的内涵。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以基层林业干部禹奕泽的工作变动为明线,描述其重返泰山、面对昔日竞争对手,攻克迁坟、护林、防火等难关的过程,其间穿插人物家庭的变故,勾勒出他曲折复杂的人生浮沉;另一条以泰山人的“离去—归来”心路历程为暗线,展现老炮台、禹奕泽、叶老师等人经历心灵重创后的救赎之旅,两条线索纵横交织,完成了对泰山人生活史与心灵史的书写。小说中老炮台对道、



## 《纪录片创作教程》



作者:武新宏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纪录片创作教程》是作者在深入研究中外纪录片并结合丰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的,它以国家一流课程“纪录片创作”的教学大纲为基础,吸收了众多教材的精华,并融入了作者的独特见解。全书分为理论篇、实践篇和分析篇三大部分,旨在对纪录片的创作理论和技法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解读,为学习者提供实用的指导和帮助。《纪录片创作教程》的特点是技术与理论相结合,具有完善的体系结构和鲜明的指导性。它不仅传授创作技巧,而且深入探讨技巧背后的原理和发展历程,帮助读者理解其深层次的原因。书中还全面构建了纪录片创作的知识体系,从基本概念到实践操作,再到作品鉴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和应用循环。

## 《不与天下州府同》



作者:黄博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书名“不与天下州府同”,出自宋人文同的一句诗,指的是四川在宋代的特殊地位。文同为今益州人,仁宗年间进士,历经英宗、神宗两朝,在四川各州县当地方官,对蜀地的政风民情极为谙熟。虽然是以四川地方的特殊性作为考察对象,本书在讨论了诸种具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后发现,那些黏附在“地方”上的特殊性,与宋代的四川人自身的恶习或天赋无关,而是与整个天下大势息息相关。

本书所论涉及书法、御容、政情、民风、谣言、学术与学人等多方面的内容。北宋年间,传言蜀地逢甲午年必有动乱,王朝中枢与地方官府由此展开怎样的合谋与博弈?建立南宋,重新布局西南边陲军事重镇,特殊地缘条件下,宋朝开启了怎样的文化大整合?度正不远千里寻找朱熹,李和在战争年代“获利百倍”,地方士人不同的生命图景,反映了当时怎样的多重生存之道?本书的内容,大都出于一个历史学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

## 《炎症》



作者:[美]希尔帕·拉维拉 著 钟与氏译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衰老意味着人终将发炎。炎症性衰老,这是一种弥漫在老年期的、低烈度的慢性炎症。”本书介绍“炎症性衰老”的概念,随着人体老去,身体积累了许多生物碎片,对系统造成压力,这会激发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反应,在此过程中促进了炎症性衰老。

本书提出,人们应当重视炎症的形成以及影响。许多炎症难以被察觉且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被检测,这类炎症被称为“隐性炎症”。尽管“隐性炎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但其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关,其潜在的威胁不容忽视。

有些食物和烹饪方式是健康的,有些则令人发炎。在高热和几乎无水条件下烹饪的蔬菜,如烧烤、油炸、炙、烤、煎等手法,会积累多种炎症性副产物,那些脂肪含量高或加工程度高的食物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且肉类、奶酪、黄油和蛋等动物性食物这一效果尤为明显。相反,富含碳水化合物和完整植物性食物(水果、蔬菜、谷物和豆类)一般积累这类破坏性化合物的水平最低。